本版编辑：　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5年6月8日

新时期论坛

现代化的机制与力量

□王　巍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是实现现代化。怎样从学理上把握当代中国现代化这个根本问题？可以用三种机制和三种力量这一学术框架进行分析。

三种机制和三种力量

一切运动着的事物，都具有动力、平衡和调整三个根本要素。自行车要跑起来，首先要有动力，没有动力，它寸步难行；自行车在骑行过程中必须保持平衡，否则就会跌倒；既要让自行车跑得快又保持平衡运行状态，骑自行车的人必须具有娴熟的调整技能。与之相应，任何社会都具有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根本机制。

动力机制、平衡机制、调整机制是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三种根本机制。就现代化的规律而言，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规律是怎么处理好发展、稳定和改革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发展及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当发展起来以后，民众表达诉求日趋增强，一旦社会不能为满足这种诉求提供足够资源且资源配置不合理，那就会发生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因而现代化还必须解决好稳定及平衡机制问题。发展和稳定及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问题，都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本质上就是通过调整机制的运行，使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之间达到优化、协调、配合。

资本、国家和劳动是现代社会的三种决定性力量。市场经济中形成的资本、权力系统中升华出的国家、最大多数人从事的劳动，是现代发达社会复杂有机体的三大要素、三大支柱，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三种最基本力量。问题在于，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不同，由此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历史抉择。

相互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要解决了动力问题，“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资本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创造文明和财富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异化的逻辑。后一种逻辑在政治领域使权力异化，在文化领域产生精神异化，导致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还会导致生态危机。此外，资本的力量存在很多风险因素，比如过于短视、唯经济利益、自发无序混乱等，这些使得资本的逻辑和逐利的原则无限扩张，不择手段地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公。

此时，国家的作用就应该发挥出来，主要是解决好平衡问题，在利用资本的同时驾驭资本，协调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此外，劳动是国家和资本之间的中介。劳动的力量不断促进着调整体制的形成，如何看待劳动和劳动者，把从事劳动的广大人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还决定了调整机制能否实现好。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应当是动力强劲、活力勃发，而又同时平衡有序、稳定和谐，又能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整合的社会。因此，检验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标准，根本上是考察它的国家、资本和劳动三种力量以及三者结合的程度，考察动力机制、平衡机制、调整机制以及三者结合的程度。

中国道路是三种力量的重构和三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重构了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机制，将资本、国家和劳动三种力量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和贯彻了这种思路：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资本的力量，强调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这是动力机制；也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平衡机制；同时，“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要求我们随时随地根据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来进行方针政策的调整，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让改革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是调整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既不是资本利润，也不是国家膨胀，而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中国道路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合理结构，是资本、国家和劳动三者的互相平衡和制约。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现代化，应当统筹使用动力、平衡和调整三种机制，协调好资本、国家和劳动三种力量。更加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更加注重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和公平正义问题，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注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可以有效地引导其他发展中国家思考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因而，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模式选择来看，中国相对独特的道路就具有了一般意义，或者世界意义。

专家视点

让国家既有效又有限

□燕继荣



在学术讨论中，现代化被认为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或趋势，它引发或决定了人们生活价值和理念的变化，从而进一步要求制度变迁和治理体系及能力的重新构建。那么，现代化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变化？回顾17世纪以来世界的新变化，可以对这些变化进行如下归纳：世俗化和理性化，与市场交易相伴随的是契约精神、行为的世俗化和理性化；流动性，人口、物资、信息突破地域局限，在更大范围内流通，以至于全球化成为一种趋势；统一性，随着流动性的发展，管理、标准、规则日趋统一和一致，要求各国的管理规则尽可能对接；均等化，流动性带来了资源、服务分布的均等化，差异性在减少，与此相应，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全球呈现拉平效应；专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专业化程度普遍提高，管理精细化要求日益强烈。

从17世纪算起，现代化过程经历了300多年历史。上个世纪开始，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考察现代化以来迄今为止的社会变化时指出，“实证证据表明，现代化的每个阶段都带来了人们世界观的不同变化”。根据他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的现代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业化的现代化和后工业化的现代化。“工业化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文化变迁过程，带来了官僚化、理性化、集权化和世俗化。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导致了第二个重大的文化变迁过程：日益强调个人自主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两个文化变迁都改变了人们的权威取向，但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现代化的工业阶段带来了权威的世俗化，而后工业阶段造成了从权威中解放出来”。“工业化社会注重不惜代价取得最大的物质产出，以此为人类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径。这个战略在减少饥饿和提高预期寿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在后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后工业的现代化带来了一种战略上的转变，从物质生活水平最大化转变为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达到福利最大化”。因此，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两个主要维度的文化差异：与工业现代化相联系的是世俗理性价值观的兴起，导致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宗教信仰转变为世俗理性观念；与后工业现代化相伴随的是自我表达价值观的兴起，导致个人自主感的增强和从权威中解放出来的愿望。

不管是工业现代化，还是后工业现代化，这个过程对于国家乃至全球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提出了什么要求？这是政治学科力图回答的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政治学基于现代化的研究形成了两大路径：观念导向的理想主义路径和问题导向的现实主义路径。前者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观念，着眼于普遍人权的进步，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出发，着重研究一个社会如何保障公民权利，因此，符合这一理想的政体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后者基于既有的传统社会面对现代化冲击所遭遇的困境，关注如何重构稳定秩序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威秩序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条件，而政府能力或国家能力通常在这种研究模型中会得到特别强调。

现代化研究的现实主义路径认为，现代化扩大了人们的眼界，释放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增强了人们的行动能力，这一切对传统社会管理构成了挑战，通常转化为人们对于以往秩序和规则束缚的不满和抗议行为，从而造成社会不稳定。诚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造成不稳定；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积极的策略只能是通过制度的适应性变革，提高制度化水平，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判断，政治学研究形成了“现代化”“国家治理危机”“制度变革”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的直白表述就是：现代化过程引发国家治理危机，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做出调整；政府只有通过制度体系的变革顺应这种趋势，才能化解和应对国家治理危机。

现代化研究的两大路径与现实的改革政策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基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改革与基于权利的改革存在差别，正如基于权利的国家秩序观念与基于治理的国家秩序观念会有所差别一样。假如说存在不同的政治改革模式，那么，以个人权利为动力的政治改革和以国家治理为动力的政治改革，其侧重点也会略有不同。基于国家治理效能的改革可能强调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站在国家整体绩效的立场上，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基于个人权利的改革可能强调社会的公平性，站在保障个体权利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公民有更大自由，如何让公民有更多民主参与机会，等等。

上述两种路径的差别本质上反映的是对国家的不同态度。在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中，国家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捍卫者，也是潜在的威胁和妨害者。这种态度体现在诸如早期“政府是必要的恶”以及近期“诺斯悖论”的种种命题和表述当中。这些表述情境不同，但都揭示了现代国家面临的双重任务：国家构建与国家治理，国家构建强调建构一个有效国家、有为国家的迫切性，国家治理强调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和治理的必要性。国家必须足够强大，这样才能具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权力不能过于任性，以至于可以不受约束，随意滥用。因此，让国家既有效又有限，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命题，也是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内容。

国民党军队学习的敌后游击战

□吴文珑

游击战争是抗日持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抗战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广泛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然而，国民党却并不重视敌后抗战，其零星的游击战略思想仍处于酝酿阶段，且多为碎片化的主张，远未达成集体共识，更谈不上作为一种战略提上决策议程。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国共军队的配合作战，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在统一战线中影响和推动国民党转变政策，便是其工作的一大重点。抗战初期，作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宣侠父，就利用自己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战术认识，帮助其军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

宣侠父与胡宗南的此次接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逐步实现，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共同御侮的局面基本形成。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侵略也进一步加剧，并将侵略重点继续指向华北，中日关系在日本朝野发出的疯狂侵华叫嚣声中变得日益紧张起来。对此，胡宗南十分愤慨，“习闻日本侵我种种暴行，极为愤慨，对宋哲元冀察中立化，尤为憎恶，敌气心特强”，他认识到“中日必出于一战”。但在此时，包括胡宗南第一军在内的国民党部队因很少与日军交锋，基本缺乏对日作战的知识和经验，而即使是那些已经局部开展起来的游击战争，也大多是自发和被迫的，是作为某种局部的战术配合来使用的。因而一旦正面阵地被突破，国民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游击战抵御日军的功能，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对敌后毫不顾忌。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7年4月，因日本侵华的加剧，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东移徐州、连云港一带，负责守备苏北海防及徐州各战略要点。胡宗南为了提升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水平，多方招揽军事人才。他知道作为浙江同乡和黄埔同窗的宣侠父知识渊博、文武兼备，对与日军作战颇有研究，便多次邀请宣侠父来徐州考察与讲学。恰在此时，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宣侠父正忙于南北奔走，致力于开展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借此机会，1937年8月下旬，宣侠父经由西安到达徐州，竭力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胡宗南见宣侠父到来，非常高兴，待其如上宾，共同商讨对日作战问题。其间，宣侠父述及了应怎样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观点，提出了应当注重通过游击战术对付日军的建议，得到了胡宗南的赞许。胡宗南随即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以作为教育部队官兵的教材。应胡宗南之请求，宣侠父综合其所讲之内容及平时的思考，很快撰写出《游击战争概述》一文。胡宗南阅后，深表认同，当即印发部属学习参考。



1939年，国共合作开办南岳抗日游击干训班

宣侠父仅用一天功夫完成的《游击战争概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定义、战略地位、战略原则和基本方法诸问题，是抗战初期少有的系统论述游击战争的著述。

1938年8月，《游击战争概述》在西安《救亡》周刊第五期上发表，引起了国民党军事界的称道与文化界的关注。宣侠父的徐州之行和《游击战争概述》一文，无疑对胡宗南的战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胡宗南后来说：“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

这样，抗日战争初期，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热潮，有力地推动抗日战争的发展，宣侠父利用自己所擅长的游击战术，成功地帮助胡宗南改变了战术认识，影响并推动了其部队的抗日战略思想。之后，在中共的屡次建议和国民党部分将领的提议下，国民党终于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战略。因此，总体上看，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敌后部队之所以一度“倍受鼓舞，斗志昂扬”，在策应作战和攻势作战上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结果。在中共的推动和影响下，国民党的敌后队伍逐渐得到发展。

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识、战略目的，以及对游击战争原则的认识和应用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最终导致了双方敌后游击武装此消彼长的不同结果。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将游击战争上升为战略问题来对待，始终依靠人民力量，坚持发展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创造出了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最终获得了胜利；国民党却适得其反，忽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甚至错误地将阵地战运用于游击战场，使得游击战的效用大为贬值。

理论研究

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

□赵振宇

程序是指事物运动的某种次序或过程或环节，含有某种秩序或顺序的意思。程序含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这些程序的设置，保障了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但是，要真正让每一个环节落到实处，还需要对这些上位法定程序作出更加具体可行的下位操作程序，如对“集体讨论决定”这个法定程序就需要设置科学有效的保障程序。为“集体讨论决定”设置科学程序，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将决策讨论件提前送达讨论者手中。这里强调的是时间程序：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的，没有时间的保证，再好的愿望也只可能是一句空话。我们经常会参加这样的会议，到了会场才看到需要讨论决定的材料。大家临时发挥，很难保证对所需讨论问题的科学全面认识，这样的决策虽经“讨论”，但它的科学性是会受到影响的。

应有两个以上可供讨论或有不同意见的决策方案。这里说的是空间上的程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多元化、多样化是一个重要特征。在讨论重大行政决策文件时，只有一个版本供讨论，充其量只能是小改小革，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科学性。行政决策就是要在不同意见中比较选择。在提供多个或不同意见方案时，可发表主持方的意见，这样既保证了方案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也体现了主持方的意见，使讨论更加集中更有成效。

对特殊领域或专业的问题，拟请相关专家到会解读。这里讲的是人员选择的程序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请参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看似民主的提倡其实是不科学的。规范性文件，涉及的领域和问题，不是每一个教授或专家都有发言权的，如果主持人请了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开会讨论，他们又很踊跃地“畅所欲言”，那样是得不到真正好效果的，有时还可能把事情办砸。研究什么样的问题请什么样的专家（可根据情况适当放宽人选），这是保证讨论科学高效的又一个程序。

记载参与讨论者的不同意见，以便根据档案资料奖功罚过。以证据说话，实事求是，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文件制定的科学性和参与讨论决定的领导者、与会者职责的严肃性。强化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在任者责任，还要对已经离职、卸任者实施终身追究。同时，对决策文件收到良好效果、发挥积极作用的参会人员，也要给予表彰和奖励，这些都需要有原始纪录为证。

设立监督反馈机制，随时调整和修改决策。事物都是在运动中发展中变化的，不可能有任何一项决策文件放之四海而永远正确。只有设立及时通畅的监督反馈机制，让讨论者不断听到、看到决定文件的实施情况，才能保证尔后的讨论更加有的放矢、步步深入、日趋完善。

“集体讨论决定”是个重要法定程序，让我们为它设置更加科学有效的保障程序，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